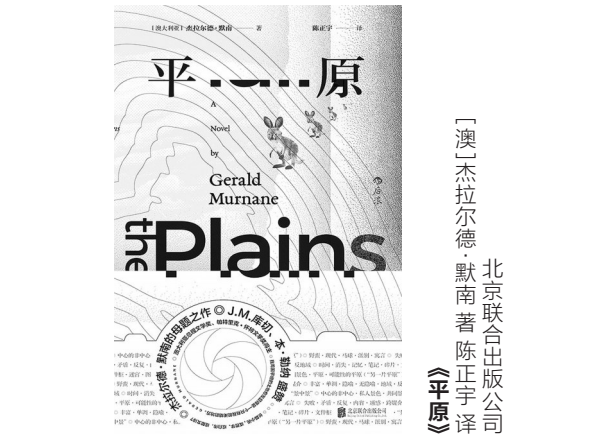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沉默的地平线

□张无极

在澳大利亚文学的广袤版图上,杰拉尔德·默南的《平原》犹如一块拒绝被开垦的精神飞地。这部曾获帕特里克·怀特文学奖的作品,以其极简的叙事线条与丰饶的隐喻层次,构建了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平原王国。表面上看,这是一位电影制作人深入澳大利亚内陆寻找创作灵感的简单故事;深层而言,这是对殖民想象、空间政治与艺术本质的哲学勘探。默南用精确如手术刀般的语言,剖开了“平原”这个地理概念的表层土壤,暴露出其下盘根错节的文化神经——那里有对无限空间的恐惧,有对解释冲动的抵抗,更有对存在本身最原初的困惑。当全球化的推土机试图铲平一切差异时,《平原》固执地守护着那片无法被同化的精神荒漠。

默南笔下的平原首先是一部反殖民的地理诗学。与传统的澳大利亚内陆叙事不同,《平原》拒绝将这片土地描绘成等待被征服的蛮荒,或是供城市人投射浪漫想象的空白画布。小说中那位执着于拍摄“真正平原”的电影导演,实际上延续了殖民者的凝视逻辑——他假设平原需要被“解释”“捕捉”和“呈现”。而平原居民们对此的漠然态度,构成了一种精妙的反抗:他们不需要外来者赋予意义,因为平原本身就是自足的意义系统。

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·索亚的“第三空间”理论有助于解读默南的平原。这个既非纯粹物理环境也非完全心理建构的“他者空间”,在小说中表现为一系列悖论:平原既是无限开放的又是严密封闭的;既单调乏味又充满细节;既欢迎外来者又拒绝被理解。当小说中的平原居民说“我们不需要地图”时,他们实际上在宣告一种彻底的去殖民空间认知——平原不是被穿越的对象,而是存在的境况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默南对光线的文学处理。在大多数内陆叙事中,刺目的阳光是核心意象,而《平原》却聚焦于黄昏时分的模糊光线。这种美学选择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:殖民视觉依赖绝对的清晰度,而平原的真正本质存在于“看得不太清楚”的暧昧时刻。

另外,默南对“细节”的处理尤其值得玩味。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,细节用于建构真实感,而在《平原》中,过量的细节反而产生超现实效果。当叙述者不厌其烦地记录窗帘的摆动方式、茶杯的摆放角度、衣物的褶皱形态时,这些细节不是通向“更深层真实”的线索,而是构成了拒绝解释的表面之墙。这种写作策略与当代艺术中的“超级写实主义”形成有趣对话——当再现精确到极致时,它反而颠覆了再现本身的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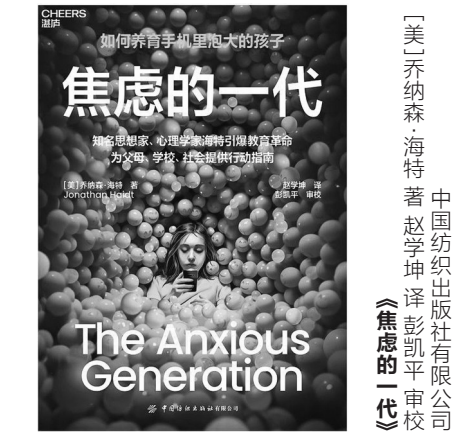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中“边界”的缺席与在场构成精妙的辩证关系。平原看似没有边界,但每个人都能感知到不可逾越的界限;社区没有围墙,但外来者永远无法真正进入。这种空间配置反映了澳大利亚自身的地理心理困境——作为被海洋包围的大陆,它同时感到窒息性的孤立与防御性的安全。

《平原》中的对话具有独特的节奏与温度——它们既不推动情节,也不揭示性格,而是像平原本身一样,既敞开又封闭。默南创造了一种“平原话语”:句子简短,话题琐碎,沉默与言语同样重要。当代社会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·罗萨将现代性定义为“时间匮乏”,《平原》则提供了完全相反的时间范例:这里的居民拥有无限的时间,因为他们不把时间视为需要“花费”的资源。小说中那些看似“浪费时间”的场景——整日观察云的变化,连续数日记录同一株植物的生长——实际上是对现代时间暴力的彻底拒绝。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忙着追赶截止日期时,平原居民生活在另一种时间体制中,那里没有延迟,因为没有预期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默南对“事件”的处理。在传统叙事中,事件推动情节发展,而在《平原》中,所谓的“事件”(如导演的到来)最终被证明毫无意义。这种叙事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哲学效果:它质疑了现代人对“事件性”的迷恋,暗示真正的生活可能存在于那些不被视为事件的日常重复中。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所说的“存在的密度”,《平原》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——存在如此密集,以至于任何事件都无法穿透。小说最后,导演的影片注定失败,因为平原拒绝被框定在胶片上;同样,默南的小说也拒绝被框定在解释中,它保持着自己的神秘性,像平原的地平线一样永远后退。

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·巴特所说的“作者之死”在《平原》中获得最彻底的实现。这不是因为默南放弃控制文本,而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抵抗单一解读的叙事宇宙。每个读者都像那位导演一样,带着自己的解释框架来到平原,最终发现这些框架毫无用处。平原只对那些放弃解释冲动的观察者展现它的美——这个悖论也许是默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学启示。

在信息过载的当代社会,《平原》的极简主义构成了一种精神解毒剂。它不提供答案,因为它知道真正的问题不是缺乏答案,而是我们提错了问题。当我们合上这本书,那片文学平原不会消失,它会继续存在于我们的心理景观中,成为对抗解释暴力的精神保留地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平原》不仅是一部小说,更是一种生存策略——教导我们在充满噪音的世界中,如何守护内心的沉默地平线。



无法自拔

□陆远

女儿今年12岁,差不多从她幼儿园开始,我就发现,她对智能手机(乃至一切电子设备)的熟悉程度,远远超过我的想象。与此同时,她对智能手机的依赖程度,也在与日俱增。相信许多家长和我一样,多少尝过智能电子设备在育儿时带来的“甜头”:无论何时,只要塞一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给孩子,就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待上几个钟头,不给父母“添乱”。的确,以智能手机、智能手表、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,在便携性、个性化和互动性方面的优势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科技产品。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,依托这些移动终端建立起的电子信息系统,彻底改写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方式,并进而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进程,其规模之大,程度之深,令人难以想象。而受其影响最大的,恐怕要数1995年后出生的一代人,他们通常被称作“Z世代”。

“Z世代”身上有不少醒目的标签:他们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的“互联网世界原住民”,是历史上与移动互联网紧密相伴度过青春期的第一代,也是在虚拟世界信息自由度最高的一代人……看上去乘风破浪,凯歌高扬。然而,心理学家乔纳森·海特却用翔实的数据和经验材料揭示了社会事实触目惊心的另一面:“Z世代”也是人类历史上与真实世界接触最少的一代,更进而成为心理疾病确诊率远超以往的一代。在去年推出的新著《焦虑的一代》中,他警告我们,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,已对“Z世代”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创伤。这样的现象并不止于哪一个或几个国家与地区,如果学校、家长 and 全社会再不行动起来,亡羊补牢,最终事态将演变成无法弥补的“世界性沦陷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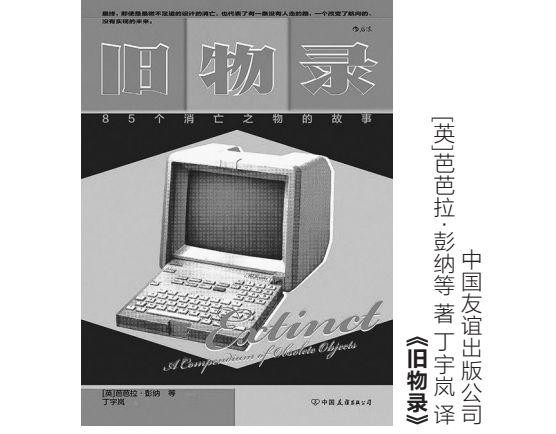
海特说,相比于其他动物,漫长的童年是人类祖先通过进化留在我们基因里的一份礼物,理想的童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自由玩耍。对于个体生命历程来说,面对面的、实时的自由玩耍具有重要的意义:正是通过玩耍,儿童构建和完善了大脑的神经结构,学会与他人保持行为的协调和情绪的统一,并进行社会化的学习。面对面的玩耍具有很好的进入门槛和退出成本,孩子们需要用心去维护社会联结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玩耍中,儿童学会调动全部身体和精神系统与他人交换信息,接收和解读对方的情绪,给予适当的反馈,最终成长为有血有肉、头脑健全、活生生的“社会人”。

然而,在“手机式童年”那种非面对面的、非具身性的虚拟世界里,孩子们的身份认知、自我意识、情绪模式和人际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固然打开了体验新世界的大门,却让他们牺牲了成长所必需的关键体验。“Z世代”的孩子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浏览手机屏幕,通过过度修饰的图像和视频审视陌生人的生活,与家人和身边朋友的接触却日益减少。只需要动动手指和眼球就可以建立的人际联系,是虚浮而脆弱的。这种“一言不合就退群”的虚拟关系,准入门槛和退出成本都极低,造就了看上去骄傲而独立,实际却异常孤独的一代人。海特进一步将“手机式童年”对“Z世代”的伤害归结为四个方面:社会剥夺、睡眠剥夺、注意力碎片化和精神成瘾。

接下来,海特指出导致这一切重要的社会原因:家长、学校和整个社会在现实世界对孩子过度保护,在虚拟世界却过度纵容。一方面,出于对所谓人身安全的过度担忧,父母和社会极大地限制了儿童在现实世界中的自由探索、独立玩耍和承担风险的机会,殊不知磕碰、伤痕和眼泪是成长不可缺少的教具,“一个让人有机会受伤的环境,才可能让人学会如何保护自己,避免伤害”。另一方面,对充斥在互联网世界里的那些不适合孩子发展阶段的信息内容、社交压力和成瘾机制,家长和社会既缺乏足够的警惕,在必要手段上更显得捉襟见肘。

在本书的最后,海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(例如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使用智能手机和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等)。不过他更强调,想要真正疏导这场择人而噬无形的信息洪流,需要更宏观的制度设计和社会合力。

我想我在



珍惜存在的旧物

□思郁

每个时代都是旧物逐渐消亡,新物逐次诞生的时代。新与旧的交替从来不是截然分明的,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,丢弃了对旧物的热爱,把注意力转向新物。通常而言,我们会认为,新物的诞生意味着进步、文明、便捷,但旧物的消失,也并非代表陈旧、过去和落后。新旧之间是有辩证法的,新物会变成旧物,旧物也会翻新、复古,重新成为新潮的一部分。我们会迷恋新物,也会怀念旧物。某种意义上,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恋物史。

近期读过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是《旧物录》,书中搜集了85种曾经存在,但是又逐渐消散的物品的故事。给这些旧物写了85篇存在小传,讲述了它们被发明、传播、影响,以及最终被人遗忘的历史。这本书非常有意思,最初,每一个物品都被赋予了一种改变未来世界的野心勃勃的想象力,但这个乌托邦的实现过程,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,最终导致新物变成了旧物,逐渐被人遗忘。有些物品的失败让人惋惜,有些物品的发明让人惊叹,有些物品的发明又让人发笑,还有些让人产生恐惧。所有的新物变成旧物的过程,也是我们人类历史一波三折发展的过程。

在书中关于《协和式飞机》那一篇,有句话总结得非常好:“旧物的消亡并不意味着物品的失败,而是支持它们存在的那个世界消失了。”像协和式飞机、飞行汽车、水上飞机、齐柏林飞艇等等,都属于这类发明,它们的出现代表了那个更有科幻感的未来世界,在很多电影中,都曾出现过它们曾经存在的身影。

在影片《夺宝奇兵3》当中,当男主角印第安纳·琼斯巧遇希特勒之后,登上了一艘齐柏林飞艇——我一度认为,这当然是编剧虚构的情节。但是历史证明了,早在1899年,德国军官齐柏林伯爵就建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飞艇,20世纪30年代,很多德国富人就喜欢乘坐飞艇飞越大西洋,前往北美和巴西。这些飞艇庞大到200多米,是现代飞机的三倍多,时速可以达到130千米,飞越大西洋大概要4天时间,所以飞艇上有豪华客房,有餐厅、表演大厅,富人可以边看演出,边享受美味和啤酒,正如电影中呈现的那样。

书中还有很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发明,比如蛋白质切断器,专门为了治疗精神病人,插入病人大脑,切断大脑额叶组织的一种邪恶机器。还有放血器,顾名思义,为了治疗疾病,给病人切开皮肤,放血治疗的一种仪器。

但也有些发明让人觉得可惜,比如电动汽车。最早的电动车出现在1897年的伦敦,叫“蜂鸟”出租车,是为了代替出租马车出行而发明的。但是,推行“蜂鸟”出租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,首先蓄电池充一次电,可以行驶大约56千米,出租车司机就需要谨慎规划路线,因为当时伦敦只有一个充电站。另外,在电动出租车出行成本更贵、速度更高的情况下,意味着危险系数增高,更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,导致电动出租车逐渐消亡了。

书中还提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,挪威生产的“思想城市”电动汽车,已经基本接近于现在的电动车,它使用环保材料、设计创新,但是依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推行。直到特斯拉出现,我们才逐渐接受电动汽车的理念。现在大街上遍地都是电动车,可见从新物到旧物的过程,也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,我们无法预料哪种发明如何才能赶上时代的风潮,占据我们的生活。

书中还提到了很多不起眼、看起来一直处于消亡过程,但是依然默默发挥作用的旧物,比如拍手开关对比现在的声控灯,白炽灯泡对比现在的LED灯,机械复写器对比现在的复印机,单人电动车对比现在的电瓶车,钢笔对比自来水笔等等,与其说它们在消亡,倒不如说是进化更合适。

正如本书前言中总结到的,“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,即很难找到真正消亡的物品。进入消亡之物的世界,就是进入死灰复燃的世界,几乎没有物品会完全消亡。许多物品会休眠,等到环境变化时,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在另一个地方复活……即便物品本身已经消亡,许多物品也会留下残余的蛛丝马迹,以设计特征、语言或行为习惯的形式存在。”

我们的世界曾经是一个充满物的世界,新物与旧物同时存在。我们对物充满了迷恋和好奇,当一个物品消亡时,我们恋恋不舍,在记忆中回味与它相处的瞬间。用哲学家韩炳哲的说法,物构成了大地的秩序、生活的瞬间,为我们的居住和生活构建出安定的环境。但是,物时代也逐渐消亡了,我们处于一个物到非物的时代,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与天空,而是居住于谷歌地图和云数字当中。珍惜存在的旧物,大概也是一种心态的变化,我们与其说是在恋物,但不如说是想抓住过去可靠生活的实感。